

文明冲突中的中国文明与人口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人口要素

李建新

【内容摘要】“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亨廷顿关于文明、文化冲突的分析范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视角。在此视角下,本文讨论了文明冲突的本质以及中国文明的特质和作用;讨论了人口要素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本文最后指出,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

关键词:文明冲突;人口规模;人口结构

【作者简介】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邮编:100871

自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撰文表明国际社会关系为“文明冲突”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再次浮出水面,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再次广泛关注。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的世界,既不是如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后的一个“欢欣而和谐”的世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二元世界,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亨氏认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未来文明之间冲突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20世纪后半叶,国家地区间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车臣、克什米尔、中东等地的战争以及21世纪“9.11”恐怖事件和最新的伊拉克战争,似乎都有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的痕迹,而且,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理论正在演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固然国际社会间以及不同民族集团间的冲突背后有着诸多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亨廷顿的文明、文化冲突的分析范式的的确确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认真关注的视角。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文明冲突”的问题同样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当今的文明冲突中,中国文明可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明的兴衰与人口规模和结构又有什么关系?

1 文明冲突的本质与中国文明

“文明”、“文化”是比较复杂和多歧义的概念。在亨廷顿所指的“文明”中至少包含两种含义,即作为价值观形态的文明和作为共同体的文明,而其“文明的冲突”既是指不同价值观或思维模式的冲突,更是指禀承这些价值观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当今世界上,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21世纪伊始的“9.11”恐怖事件和2003年的美伊战争就彰显出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会有这种文明的冲突呢?亨廷顿在考察从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和其向外扩张的1400年的历史中发现,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

突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亨氏认为,伊斯兰与西方这种冲突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另一方面,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富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亨廷顿,1999)。伊斯兰的“圣战”和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反映。

其实,要深刻地理解文明冲突的本质,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文明的源头。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伊斯兰文化和东正教同西方文明一样,根植于同一种希腊-叙利亚的“文化复合肥料”之上(汤因比,2002)。这里的“叙利亚”并非仅仅是现在的叙利亚,而是历史上的“叙利亚”,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叙希”即叙利亚和希腊文明才应该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不仅如此,“叙希”文明还是伊斯兰、东正教和犹太教文明的起源。这几大文明都有共同的源头,耶路撒冷同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大宗教圣地的的事实就是这些文明亲缘性、同源性的最好写照。作为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共同源头之一的所谓“叙利亚文明”有两个鲜明而重要的特征(亨廷顿,1999;阮炜,2002):其一是宗教性的一神论或惟一神信仰。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惟一、绝对、永恒的,是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叙利亚文明”第二个重要特征是神选意识。无论是在犹太教的《旧约》中,还是在基督徒的《新约》中都有明显的神选意识,即信徒都是属于“神、上帝的子民”。同样,伊斯兰教也有黑白分明的以信教与否划界的“异教徒”意识。

惟一神信仰和神选意识的结合,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宽容且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极易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这种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惟我被选的文化心态不仅导致了叙利亚型文明之间的长期的对峙,也造成了这些文明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的冲突。远去的历史不论,在人类告别的20世纪和刚刚进入的21世纪里,各种冲突或战争持续不断,这些冲突大多都涉及到与叙利亚文明有关的四大文明和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发生在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冷战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争发生在基督教(克罗地亚)、东正教(塞尔维亚)、伊斯兰教(波斯尼亚)之间;而“9.11”事件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同样有着浓重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阴影。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文明就一直处于强势。在西方文明征服世界过程中充满着血腥和残酷。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中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应该对西方文明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负责,对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负责,对西方人在全球扩张中的杀戮和劫掠负责,尤其应对一些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负责。

与上述“叙利亚”型的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既没有一神教的渊源,即使佛教传入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也以多神论为特征,也没有“神的选民”的排他性观念。相反,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中,有一种“中庸、中和、宽容、和而不同”的特质。中国文明内核“儒、释、道”形成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宽容、求同存异的结果。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战乱冲突不断。但像“叙利亚”系文明之间以文明、宗教相异而引发的冲突战争却不多见。中国人会为生存而战,却少有为宗教信仰而战的。这是中国文明与“叙利亚”系文明明显不同的地方。同样,中国文明的中道、宽容还体现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正如费孝通教授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其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1996)。对于外来民族,中国文明也同样透出了一种宽容。历史上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进入中国就是一例。犹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很早就散布在世界各地。由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犹太人孤立于异教之中,受尽迫害和打击,但尽管如此,犹太人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宗教。不过,潘光旦先生在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现,历史上来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在不长的时期内被同化了。之所以如此,主要

是因为中华文明对异族、异教、异文明一般都兼容并蓄,提倡“中外一体”、“天下主义”,对犹太人集团也不例外。因此,吴泽霖先生在潘光旦先生《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序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宽宏气魄,不但对犹太人,而且对同她接触的任何民族都是不变的。因此,她总是能够同别人和别的民族和睦相处,最后溶为一体。宽宏大度、取人所长、平等待人,至今仍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潘光旦,1983)。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到贫瘠战乱的中国依旧对中国文明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指出,未来的200年将表明,中国人何去何从,将是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罗素,1996)。

显然,中国文明中“中庸”、“中道”、“宽容”、“和而不同”的特质,都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和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不同文明的共存和人类持久和平将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亨廷顿所预言的中国国力强大之后,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构成威胁和挑战,从正面理解亨氏的警示是有意义的。其实,任何一种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不过,从中国文明的“中道”、“宽容”、“和而不同”的特质出发,中国文明不可能成为排斥他者独霸天下的文明。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张扬和扩展中国文明中“中和”、“宽容”理念是避免“文明的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良方。中国文明中“中和”、“宽容”的智慧是对叙利亚形态文明不足的弥补,随着中国软实力日益强大,中国文明所彰显的和平主义、“中道”思想,将会对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将会惠及和造福全人类。

2 人口与文明的兴衰

人类文明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起落都与文明规模和文明能量有关。而文明规模取决于该文化共同体的规模(人口规模)、疆域、经济规模、以及该共同体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力和军事能力等(亨廷顿,1999;阮炜,2001),其中,人口、经济规模是衡量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宏观的久远的历史视角看,人口是一个共同体文明规模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

文明的规模和能量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口规模、疆域和经济规模。西方文明的复兴和崛起恰恰是这几大要素交汇壮大之时。15世纪末,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西方领土扩张的序幕,17世纪、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给西方文明注入活力和动力;18世纪、19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翼,实现了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西方文明大体上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逐步走向强势,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1920年西方领土扩张达到了高峰,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土地,占世界领土的48.5%;1920年西方文明控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8.1%;1928年西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比重为84.2%;西方经济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前达到高峰约为70%;192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人数)所占份额比重为48.5%。不过,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西方文明整体上来说仍将是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西方文明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技研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更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其他资源的控制将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100年之后,西方可能控制的领土约为世界的24%,人口为10%,经济总产值约为30%,制造业为25%,军事力量不到10%。西方文明不可遏制地走向衰退,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非西方文明正在复兴(亨廷顿,1999)。

历史上文明的兴衰有其规律可循吗?文明的兴衰与人口要素有关吗?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多·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阐述这样一个文明兴衰观:一个文明等同一种有机体,要经历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历程,最终走向死亡,无论人类还是其他任何

有机的生命莫不如此。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处在衰退期,而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斯宾格勒,1988)。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文明的汤因比对此不以为然,他对文明兴衰的分析是其“挑战和应战”的范式。汤氏认为,文明的兴衰是可以循环重复的,这种重复既不是徒劳的也不是经久不变的。文明的兴与衰取决于挑战和应战较量的结果,当一种文明、一个社会面对各种“挑战”无法“应战”、“应战”失败时,这个文明也就开始衰亡了。而当每次挑战和应战成功激起进一步的挑战和应战循环时,则标志着文明向更好文明进步(汤因比,2002)。不过,无论是汤因比还是斯宾格勒都没有太关注人口变量会不会影响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在世著文的时候,世界人口还未完全表现出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当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著文的时候,亨氏“目睹”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两极变化的全部历史。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在世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人口规模相对减少,人口趋于老化并于20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空前膨胀,并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世界人口变迁有史以来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中的意义显露出来。因此,亨廷顿开始从人口变迁的视角关注其对文明兴衰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历史上一直就与西方文明对抗的伊斯兰世界的人口迅速增长在文明冲突中的作用。其实,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观点结合起来,加入人口要素,其文明兴衰观有其合理性。在工业化革命之前,世界人口都处在“高出生、高死亡”的高位静止状态,人口并不是一个“活跃”的变量而是一个“稳定”的常量。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生了人口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方人口依次经历了人口迅速扩张的年轻型人口、人口增长减慢的成年型人口和人口增长衰退的老年型人口。西方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年轻型人口的勃勃生机。然而,当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口进入老年型时,也即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重时,这个社会这个文明是不是就意味着如同斯宾格勒所说进入了老年,进入了衰老期?结合汤因比的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一个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这个人口构成的社会、承载的文明,是否还能从容地面对各种新的挑战(自然的如天灾、人类的如战争等),是否还能保持生机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去应战。事实上,一个老年型社会和由这个老年型人口承载的文明很有可能由于缺乏适应新环境能力和缺乏创新能力而无法从容面对“挑战和应战”,不可避免会步入衰退之路。

亨廷顿所观察所经历的20世纪后半叶正是西方世界开始显露“衰退”迹象的世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西方迅速失去了过去殖民地的疆域;西方国家人口开始陆续进入低增长有的甚至负增长。从1950~200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8亿多增加到接近12亿,增加了不到0.5倍。而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欠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其人口规模从1950年的17亿增长到20世纪末的48亿多,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2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32.25%下降到2000年的19.62%,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人口分布构成的格局。同时,西方人口趋于老化。1950年西方发达国家65岁人口的比重为7.9%,而到2000年则为14.4%,其中西方老牌的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意等国都超过了15%,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在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中,亨廷顿所特别关注的是与西方文明有冲突的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扩张,他看到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年青人口(15~24岁)增长都很快,这部分人口的高比重(一般都超过20%)加之其它因素如失业构成了对其他社会的威胁,造成了伊斯兰世界沿边境的穆斯林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亨廷顿,1998)。所以,亨廷顿非常担心伊斯兰世界年轻型人口的迅猛增长会对老年型社会的西方文明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亨廷顿同样十分担心西方世界内部人口族群结构、宗教结构变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亨廷顿认为,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过,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口的优势却是“节节败退”,亨氏十分担心欧洲这个西方文明的“老家”被伊斯兰文明所蚕食。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移民中2/3是穆斯林,伊斯兰势力正在欧

洲扩展,伊斯兰正号召穆斯林“通过与非伊斯兰多数的互相同化,使他们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社会的多数”。因此,2003年美伊战争中,西方阵营美国 and 老欧洲德、法主战主和立场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伊斯兰政治势力在欧洲的显现。在西方文明的大本营美国,亨廷顿则担心拉美裔人对美国文明的冲击。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中将有25%是拉美裔人,2050年以后美国的欧裔白人将从多数变为少数(低于50%)。因此,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李慎之,2001)。面对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亨廷顿不能不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因为,亨廷顿看到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宗教、文明、族群结构)是影响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兴衰以及文明冲突的重要因素。

不难看出,在亨廷顿所界定的七、八个文明的世界格局中,由于儒家文明(核心国为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在价值观和思维形态上与西方文明差异最大,而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力量的正在迅速崛起、伊斯兰人口的正在持续膨胀,无论是亚洲的经济还是伊斯兰的人口规模都是一个文明兴盛的积极要素,都对西方文明形成了挑战和强势,所以,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3 余 论

在考察世界各种文明的演进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国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被称为近现代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就中国文化特征指出:“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移,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有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唯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梁漱溟,1996)。比照历史上诸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唯中国文明面对各种“挑战”(天灾、内乱、外族侵略等)没有衰亡而“岿然独存”,为何?梁漱溟先生回答:是“伟大的同化力”使中国文明在时间上绵延,在空间上拓展。不管这种解答有没有存疑,一个不争的人口事实则是,承载和传递中国文明的共同体——中国人口始终保持了一个必要的规模。

在世界人口史上,无论是古代人口的推估,还是近现代人口的统计,中国人口规模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一直占世界人口的 $1/4 \sim 1/5$),中国文明共同体的中国人口始终屹立在“东方”。当然,单单人口要素既不能保证文明不衰,也不能保证文明可以兴盛。中国近代屈辱的衰亡史让每个国人都难以释怀。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经济规模、疆土规模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外族入侵面前不堪一击,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转折点。过去,不少中外人口学者秉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视角,把中国近代国力不济、民不聊生、日趋衰落归罪于中国不堪负重的人口。显然,这种“归罪”是有失偏颇的。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在中国近代人口研究中指出,中国1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近代缺少一次推动如同西方产业革命的重大的技术革命(何炳棣,1989)。而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则是晚清政府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应对“内乱外侵”的巨大挑战。今天,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政治制度上谋求改革,经济上谋求可持续发展,而业已形成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正使整个社会保持着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几大影响文明兴盛的要素正在积极“汇合”,形成良性循环,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世界影响力。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人们深信21世纪为中国的世纪。

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以及有关人口要素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多元多极的冲突世界,认识文明

的兴衰与人口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我们深信中国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如果我们深信中国文明应该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国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为世界和平“大同世界”奉献力量,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口要素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国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对承载文明的中国人口,我们要大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继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让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和而不同的宽容”、“热爱和平”的精神,在多元多极的世界中都能充当人类和平进步的使者。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实际上,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最久远的、最基本的承载体,我们必须从世界人口变迁的历史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必须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显然,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在更具长远、更具开放的时空上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我们需要尽快调整我国当前狭隘的人口政策策略。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
- 2 阿诺德·汤因比[英].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 阮炜.“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读书.2002;8
- 4 费孝通.费孝通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
- 5 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 6 伯特兰·罗素[美].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北京),1996
- 7 阮炜.文明的表现:对五千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8 奥·斯宾格勒[德].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9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读书.1997;6
- 10 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 11 何炳棣[美].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fter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the views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y American famous scholar Samuel P. Huntington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is analysis about clashes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surely deserves our concern.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nature of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trai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function,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population factors and rise and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a need to examine its long-run strategy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Clash of Civilization; Population Size; Population Structure

Li Jianxin,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

(责任编辑:沈 铭 收稿时间:2003 - 05)